



圣都与俗都：晋国都城体系的演变

潘明娟

摘要：用圣都俗都理论考察晋国都城体系发现：在晋国都城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有曲沃、绛、新田三座都城，其中，曲沃由于是晋武公一支的发迹之地，并且拥有宗教祭祀的崇高地位，因此，一直是宗教祭祀中心，是晋国的圣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宗教祭祀功能逐渐被取代；在晋国都城发展的第二阶段，绛为晋国主都，是俗都；在第三阶段，绛被废弃，新田成为晋国主都，是俗都。圣都与俗都是功能互补的关系，圣都主要发挥着国家宗教祭祀的职能。西周、晋国、秦国的都城体系均由圣都俗都组成，但是三者之间有很大不同。

关键词：晋国都城体系；圣都与俗都；曲沃；绛；新田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2-0115-07

圣都问题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之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队的领导中心。”^[1]潘明娟、吴宏岐利用这一理论研究秦国的都城体系，认为西垂和雍城均为秦国圣都，并得出结论，圣都应该具备三个特点：圣都是祖先发迹的地方；是王朝强盛的转折点；是祭祀性都城，始终保持祭仪上的崇高地位^[2]。由此，又探讨了西周时期的都城体系^[3]。田亚岐继续深入研究雍城的祭祀遗址，认为雍城不仅是秦的圣都，还是西汉时期的圣城^[4]328-341。

先秦时期，不仅是商王朝、西周及秦国实行圣都俗都制度，而且晋国也有圣都与俗都的设置。

晋国都城发展史上，标志性事件主要是以下三个：叔虞封唐、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及六十七年后曲沃武公列为晋侯（或称晋武公）、晋景公迁都新田，由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可以把晋都

城体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叔虞封唐开始到曲沃武公成为晋侯，这一时期晋国实行单一都城制度，都城由唐迁至绛，文献中出现的翼，与绛应该是同地异名。第二个阶段是从晋武公开始到晋景公迁都新田止，这一时期，晋国有两座都城存在：绛与曲沃。第三个阶段从晋景公弃绛迁新田开始（公元前585年）至晋亡，这一阶段，晋国仍然有两座都城：新田与曲沃。

本文论述的是晋国都城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拟用圣都俗都理论对晋国都城体系做全面的考察，涉及曲沃、绛、新田三座都城。其中，曲沃一直处于陪都地位，是宗教祭祀中心，是圣都；在晋国都城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绛为晋国主都，是俗都；在第三阶段，绛被废弃，新田是晋国主都，是俗都。

一、曲沃的圣都地位

从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到晋侯缙二

收稿日期：2020-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都城制度研究”（18XZ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明娟，女，历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中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26），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十八年(公元前679年),曲沃为晋国割据政权的都城。之后,曲沃是晋国的圣都。

(一)曲沃是晋武公一支的发迹之地

春秋初期晋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权,绛是晋中央政权的都城,曲沃是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

晋昭侯元年封成师于曲沃,号桓叔,成为晋小宗之强宗。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晋大夫潘夫弑昭侯而立桓叔,晋人攻桓叔,桓叔败还曲沃,晋人立孝侯。从此,曲沃与绛公开对抗,成为晋侯时期晋国的割据政权。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三代67年的经营,相继杀掉了晋昭侯、孝侯、哀侯、鄂侯、小子侯、晋侯缙,终于列为晋公^①。

曲沃三代67年志在夺取晋政权,分别于晋昭侯七年、晋孝侯十六年、晋鄂侯六年、晋哀侯

八年、晋小子侯四年发动四次推翻大宗的活动,但均被阻。前三次是因为“国人”的阻碍,后一次则由于周桓王的干涉。曲沃政权屡败屡战,每次侵绛不成,则退保曲沃。可以说曲沃是这个割据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中心。

到晋侯缙二十八年,曲沃武公灭掉晋侯,同时贿赂周釐王,终于得到认可,列为诸侯,因此,曲沃又是新政权的发迹之地。

曲沃与绛的关系,和《左传》记载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时郑都与京的关系相似,《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5]11}只不过郑的京邑小于郑都,而晋之曲沃大于晋都^{[6]1638}。曲沃本是晋之小宗的封地,因为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6]1638},成为晋国境内的一个割据政权,对原来的大宗政权形成较大威胁。由于曲沃的城邑规模较大,对于晋公新政

时间	以曲沃为政治中心的割据政权	以绛为都城的晋国政权	双方行动	出处
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	曲沃桓叔	昭侯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	《左传·桓公二年》 ^② 第93页
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	曲沃桓叔	昭侯、孝侯	七年,潘父杀昭侯预迎桓叔,国人立孝侯。	《左传·桓公二年》第95页
晋孝侯八年(公元前732年)	曲沃桓叔、曲沃庄伯	孝侯	桓叔卒,曲沃庄伯立。	《史记·晋世家》 ^③ 第1638页
晋孝侯十六年(公元前724年)	曲沃庄伯	孝侯、鄂侯	庄伯弑其君晋孝侯。国人立鄂侯。	《左传·隐公五年》第44页
晋鄂侯六年(公元前718年)	曲沃庄伯	鄂侯、哀侯	庄伯伐晋,鄂侯奔随城。周桓王使虢公伐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立哀侯。	《左传·隐公五年》第45页
晋哀侯二年(公元前716年)	曲沃庄伯、曲沃武公	哀侯	曲沃庄伯卒。	《史记·晋世家》第1639页
晋哀侯八年(公元前710年)	曲沃武公	哀侯、小子侯	阍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虜哀侯。晋人立小子侯。	《左传·桓公二年》第95页
晋小子侯四年(公元前706年)	曲沃武公	小子侯、缙	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公伐曲沃,周室立晋侯缙。	《史记·晋世家》第1639页
晋侯缙二十八年(公元前679年)	曲沃武公	缙	曲沃武公又伐晋侯缙而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釐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更命为晋武公,尽并晋地而为晋君,并列为诸侯矣。	《史记·晋世家》第1640页

表1 曲沃与绛的对立

权来说也比较重要,因此,晋献公在灭掉“桓庄之族”的第二年,任命士蒯为大司空,大肆扩建绛都,广益旧宫,以压曲沃^{[5]234}。同时在曲沃建造宗庙,不再将曲沃封赐亲属和臣下。

(二)曲沃拥有宗教祭祀上的崇高地位

按照晋献公的说法,曲沃是“吾先祖宗庙所在”。^{[5]240-241}

首先,至少“表1”中的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应是葬在曲沃的,因为以当时小宗曲沃与大宗晋对抗的情况来看,此两人不可能葬在绛的晋侯公墓之中或是其他地方。

其次,曲沃代绛的开国君主晋武公(曲沃武公)之庙武宫应该也在曲沃,理由有三:一是史籍记载重耳“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5]413},那么,武宫的地望应该就在曲沃,或者应该在曲沃附近。二是曲沃是晋武公的根据地。从桓叔、庄伯、武公三代数次击翼不成即退守曲沃来看,曲沃是割据政权不可或缺的根据地,是最后的退路,因此,曲沃在武公及其儿子献公心目当中,其被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三是武公至绛后次年即卒,绛的反曲沃势力不可能迅速被清除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武公卒后不可能安葬在绛,只能归葬曲沃。而庙是与墓连在一起的。献公时期有“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的记载,以武宫的被重视程度理当是“先祖宗庙”中最重要的。

再次,晋文公卒后,殡于曲沃^{[5]489},这是有文献明确记载的。上文已经论证晋武公葬在曲沃,而文献又没有其他晋公殡于绛的记载,因此,至少可以推测晋武公至晋文公之间的晋献公、晋惠公,可能皆归葬曲沃。

最后,除上述重要宗庙之外,曲沃应该还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祭祀场所,包括齐姜(申生之母)庙^{[5]297}、申生庙^{[5]334}等。

曲沃既是宗庙所在,又是开国君主晋武公的武宫所在,因此成为晋的新政权重要的祭祀之地,凸现出曲沃的宗教祭祀功能。晋武公至晋景公时期到曲沃的政治人物主要包括晋公、太子、重臣等,除申生在曲沃经营的十年时间之外,从晋惠公开始,文献提及曲沃都是因为埋葬国君太子及朝拜武宫,这些都属于宗教祭祀的行为。

曲沃的宗教祭祀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晋公每年孟冬之月要到曲沃宗庙举行烝礼^④。这是常制。因为按照周代制度,天子或诸侯国君每年冬祭宗庙,谓之“大饮烝”^{[7]卷十七,343}。《国语》记载晋献公时期,“蒸于武公,公称病不与,使奚齐莅事”^{[8]265}。这种不符合礼制的做法,引起朝臣及太子申生的猜疑,因此被文献记载下来。另一方面,非正常顺序即位的国君,要到曲沃进行朝祭活动,以获得宗法礼制上的支持。如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被秦师送回晋国要“朝于武宫”;公元前607年,赵穿袭杀晋灵公,执政的赵盾从周迎回公子黑臀即位为成公,也要先“朝于武宫”^{[5]663}。甚至晋国晚期非正常顺序即位的悼公^{[6]1681}、平公^{[5]1026}也要到曲沃拜祭。

可以说,曲沃是重要的祭祀场所,拥有宗教祭祀上的崇高地位。

曲沃是晋武公一支的发迹之地,同时又是先祖宗庙及武宫所在,晋公及一些高级臣僚常到曲沃进行政治和宗教活动,因此,曲沃成为晋的圣都。

二、绛的主都地位

作者已经论述了春秋前期晋国都城翼与绛为同地异名,本部分在此结论基础上论证绛(翼)的主都地位。

(一)与曲沃对抗时期的翼都(绛)地位

曲沃与翼对抗时期,翼为晋国君主大宗晋侯所在地,是当之无愧的晋国都城,“翼,晋君都邑也。”^{[6]1638}

一方面,曲沃作为割据政权,以翼为对抗的主体。《左传》记载的“曲沃庄伯伐翼”^{[5]95}“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5]44}“曲沃武公伐翼”^{[5]97-98},说明翼是晋国的政治中心。《国语》也有“武公伐翼”^{[8]251}“兼翼”^{[8]275}的说法。这些记载,均昭示了翼作为晋侯时期政治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翼为晋侯所在地。晋孝侯在翼被弑^{[5]95}、晋哀侯在翼被立^{[5]45},也说明了翼是晋侯时期的政治中心。

(二)晋献公之后绛的政治地位

晋献公时期,翼改名为绛。绛是晋献公至晋景公时期的晋公常居地,是行政中心,是主都。

首先,绛是晋公所在地,是晋国政治中心。绛有晋公所居的宫殿,公元前668年“土蒨城绛,以深其宫”^{[5]234},应该是大肆扩建都城及宫殿的行为。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申生“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同一件事,《国语·晋语二》记载“祭于曲沃,归福于绛”^{[8]289},则表明晋献公常居于绛。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入绛,即位”^{[8]367},到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卒于绛,也说明大部分晋公应该是常居于绛。

其次,绛与秦国的都城雍是相提并论的。《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的公元前647年的泛舟之役,“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5]345},这里的“秦”与“晋”均为诸侯国,“雍”为秦之主都,按照对等原则,“绛”为晋的行政中心无疑。

最后,绛的政治地位高于曲沃。《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5]240-241}。这里,出现了晋国四座重要的城市,曲沃、蒲城、屈、绛。其中,按照骊姬所言“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晋献公将自己的三个较大的儿子分别安排在曲沃、蒲城、屈,而留下骊姬与少姬的儿子奚齐和卓子在绛,则表明这条文献提到的四座城市的政治地位,由高向低排列应该是:绛、曲沃、蒲城和屈。与这条文献相关的记载也表明:与曲沃相比,绛的政治地位高于曲沃。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为申生城曲沃,土蒨认为:“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5]258}《史记》也有类似记载^{[6]1641}。其中,“都城”是指曲沃,曲沃有先君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5]242}则土蒨所说的“都城”是指有先君宗庙的城。晋献公以“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为由,“使太子申生居曲沃”,这就说明两个问题:曲沃是都城;曲沃不是晋公常住的行政中心。因此,申生出居曲沃,只能表明他已远离晋的政治核心,而曲沃虽为“都城”,并不是主都。另外,《国语》记载,申生祭其母齐姜的时候,“祭于曲沃,归福于绛”,表现了绛高于曲沃的都城地位。晋惠公元年,狐突到曲沃改葬申生,史籍称之为“狐突适下国”^{[5]334},陪都“下国”与主都“上国”相

对,更明确了曲沃的陪都地位。则政治地位高于曲沃的绛应是主都无疑。

三、新田与绛、曲沃的关系

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迁都新田,改新田为绛。晋都于此,直至灭亡。这是晋国都城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在本文中,为与故绛区别,称晋景公之后的都城仍为新田。

(一)新田与绛的关系

绛为晋献公至晋景公时期的晋国主都,新田是晋景公至晋国灭亡时期的主都,两者应该是前后相继的关系。

晋景公迁都新田完全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需要。

从政治方面来说,晋灵公于公元前607年被赵穿杀死之后,晋国公室与世卿贵族以及世卿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此起彼伏,不绝如缕,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将佐不和。绛的私家势力盘根错节,不易动摇,只有迁都才能摆脱私家势力的纠缠。

从军事方面来说,晋迁新田时,正是晋国霸业处于低潮时期。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晋师败北,楚国开始号令诸侯,齐也趁机摆脱了晋的控制,赤狄诸部蠢蠢欲动。因此,必须对内对外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重整霸业,而迁都新田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迁都新田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春秋中期的经济方式主要是农业,则土地是建立都城的首要条件,新田附近的土壤条件很好,正如《左传·成公六年》“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流其恶”^{[5]828},再加上气候适宜,使得新田在春秋中晚期成为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9]。迁都新田,可以进一步开发新土地,增强晋国的经济实力。

晋迁新田之后,其都城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田成为晋的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其主都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对绛来说,从上述政治、军事、经济的角度来看,迁都新田之后,再维系绛的都城地位实无必要。因为绛既是私家势力盘踞、景公亟欲离开的都城,则景公离开之后,晋的国君不可能再回到这里。

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绛的次数甚至不如曲沃,仅有两条。一是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晋厉公被弑后,葬在“翼(绛)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其葬礼完全不是国君的规格^{[5]906};晋悼公时期,文献记载提到了年长的绛县人^{[5]1170-1172},应该是绛已经降格为县了。除上述两条记载之外,文献上再无提及,这时的故绛应该是已经被废弃了。

(二)新田与曲沃的关系

晋景公之后,文献提及曲沃四次^⑤。

曲沃是宗庙所在地,尤其是晋国的开国君主晋武公的武宫所在,在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仍发挥其宗教祭祀功能。所以,相对于主都新田来说,曲沃仍然是圣都。

但曲沃的圣都地位已明显下降。景公之后,包括厉公、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出公、敬公、幽公、烈公、桓公,到曲沃朝拜的只有悼公和平公。与晋景公之前的晋公(晋献公、晋惠公、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几乎均亲自或派人到曲沃祭祀相比,曲沃明显不受晋公重视,其祭祀地位显著下降。

在曲沃的圣都地位逐渐降低的同时,新田的祭祀设施进一步完善。《左传·文公二年》有“祀,国之大事也”^{[5]524}的记载,而都城的建设顺序,应是“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居室为后”^{[7]卷四,75}。因此,新田营建伊始,应该就包含了祭祀设施的规划和建造。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是从考古发掘来看,侯马晋都已经发现9个地点的祭祀遗址群,其中位于牛村古城和台神古城南部有3处,分别是1962年发掘的牛村古城南250米处的祭祀建筑遗址、1991年发掘的台神古城西南6公里处浍河南岸峨嵋岭北麓的西南张祭祀遗址和1996年发掘的台神古城西南1500米处的中条山冶炼厂祭祀遗址,其余6处分别是南西庄、山西省地质水文二队、山西省第一建筑公司机运站、侯马市煤灰制品厂、秦村西北方的侯马盟书遗址、呈王路宗庙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呈弧线形分布于呈王路庙寝建筑遗址的东北、正东、东南、南、西南一带。从这些遗址的出土文物和盟誓内容可知,其时代为晋文化晚期,公元前453年前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认为,综合分析上述祭祀遗址的位置、时代、规

模及晋都新田的城市布局情况,可以看出,“位于牛村古城和台神古城南部的3处祭祀遗址于新田都城的社稷祭祀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分布在呈王路庙寝建筑遗址周围的6处祭祀遗址,与文献中的宗庙相吻合,故为祭祀宗庙遗址当无大问题”^[10]。而密布于遗址周围的祭祀坑、坑内祭祀内容的不同及多组的打破关系,都说明频繁的祭祀活动延续时间较长。

宗教祭祀地位的下降,直接导致曲沃的政治地位也降低。曲沃原本规模大于都城翼,以小宗身份与大宗晋侯对抗67年,最终取得胜利。由此足见曲沃的政治实力及影响力。但是,晋平公八年(公元前550年),栾逞在齐国的支持之下,控制曲沃之后企图攻击都城新田。晋国君臣在得知曲沃被控制之后并无惊慌失措的表现,栾逞的叛乱被迅速平息^{[6]168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曲沃的政治地位与之前相比在不断降低。

因此,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晋国的都城体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主都由绛迁到新田,绛与新田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另一方面,新田与曲沃是同时存在的两座都城,新田是主都,曲沃是陪都、圣都,随着晋人经营新田的时间增长以及新田礼制建筑的增多,曲沃宗教祭祀的地位在逐渐下降。

余 论

圣都与俗都应该是功能互补的关系。先秦时期的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承担着“祀”与“戎”两种主要都城功能,但经过区域空间权衡之后,新定的首都无法同时发挥这两种都城功能之时,就自然而然地导致祭祀性都城与军事性(或行政性)都城的出现,即圣都与俗都。圣都在军事性都城的后方,主要发挥着国家宗教祭祀职能。如西周时期的岐周^[3],春秋时期晋国的曲沃,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西垂与雍城^[2]。圣都不变,俗都常徙,也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随着主都的礼制建筑祭祀设施逐渐增加,都城功能不断完善,圣都的宗教祭祀功能被取代,其地位也会下降。上述西周的岐周与晋国曲沃、秦国的西垂和雍城的发展轨迹是类似的,其政治

地位都在逐渐下降。

比较西周、晋国、秦国的圣都俗都体系(见“表2”),会发现它们之间有所不同。

西周的圣都俗都体系是三座都城在西周时期同时存在。从都城功能来看,岐周是宗教祭祀意味较为浓厚的都城,是圣都;宗周承担着主要都城的功能,是行政性都城;成周主要承担前线都城的功能,是军事性陪都。从都城的政治地位来看,在整个西周时期,宗周一直是主都,岐周、成周均处于陪都地位,只不过到西周中晚期岐周、宗周政治地位逐渐下降,成周的政治地位愈加重要。

晋国的都城体系与西周类似,但也有细微的差异。晋国春秋时期的三座都城曲沃、绛和新田不是同时存在的,曲沃自始至终应该都是陪都与圣都地位,绛与新田则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没有同时并存。曲沃的发展轨迹与岐周相似,它们都是具有敌对关系的两个政权中相对弱小政权的都城,即西周相对于商、小宗曲沃相对于大宗晋国。随着政权实力的变化,以岐周和曲沃为都的割据政权打败了敌对政权,疆域迅速扩大至原来的数倍。为便于统治扩大了疆域,政权的行政中心迁移了,西周迁至丰镐、晋迁至绛,则原来的都城岐周和曲沃就成为政权的根据地。根据地理埋葬有划时代的政治人

物,岐周有文王、武王、周公等,曲沃有晋武公、晋文公,因此,这样的根据地都城就成为重要的祭祀地点,成为圣都。岐周与曲沃独立为都的时间不长,同时由于当时的割据政权较为弱小,从营建规模上来讲,或许也不能与后来的俗都相提并论。

与西周、晋国相比,秦国的圣都俗都体系有很大不同。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八座都城:西垂、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从时间上来看,这些都城有同时并存的,也有前后相继的。秦国的圣都有两座:西垂与雍城。张光直论述的三代“圣都”是“最早的都城”,“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这样的“永恒基地”只有一座,其他都是暂时性的俗都。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垂是当之无愧的秦国圣都。但是,随着秦离开西垂时间的增长,西垂的圣都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一点西垂与岐周、曲沃是相同的。与岐周、曲沃、西垂相比,雍城不是秦国政权最早都城。在雍城为主都时期,秦人的都城体系中,西垂为圣都,雍城为俗都。同时,秦人经营雍城200多年,雍城的祭祀设施及都城规模都已经超过西垂,因此,在秦人的行政中心离开雍城,到了泾阳、栎阳、咸阳之后,雍城仍然是秦人的宗教祭祀中心,即圣都。雍城的圣都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营时间长、

政权	时间	建都顺序	都城地位
西周	西周时期	岐周、宗周、成周	岐周:圣都、陪都
			宗周:俗都、主都
			成周:俗都、陪都
晋国	西周晚期、春秋时期	曲沃与绛、新田	曲沃:圣都、陪都
			绛:俗都、主都
			新田:俗都、主都
秦国	春秋战国时期	西垂、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	西垂:由主都转变为圣都、陪都
			汧:俗都,与西垂并存
			汧渭之会:俗都,与西垂并存
			平阳:俗都,与西垂并存
			雍城:由主都转变为圣都,与西垂并存
			泾阳:俗都,与雍城、西垂并存
			栎阳:俗都,与雍城、西垂并存
			咸阳:俗都,与雍城、西垂并存,战国中晚期的主都

表2 西周、晋国、秦国圣都俗都体系比较

都城规模大,堪为秦人的根据地和祭祀中心。这样,与西周、晋国相比,秦国的都城制度发展了圣都俗都体系。

注释

①在小宗取代大宗成为诸侯之前,晋国君主称侯。在小宗取代大宗成为诸侯之后,晋国君主始称晋公。
②此处所用《左传》皆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此处所用《史记》皆为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杨伯峻解释:“烝,冬祭名,杜《注》所谓‘万物皆成,可荐者众,故烝祭宗庙’。烝祭宜在冬十月行之,昭元年《传》云:‘十二月,晋既烝。’周正十二月乃夏正十月,足证晋亦孟冬烝祭。《春秋》书烝者,唯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两烝左氏皆无《传》,《春秋》书之者,以为非礼。若孟冬之烝,乃常祀,则不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桓公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7页。
⑤分别为:公元前572年,晋悼公即位之前,“辛巳,朝武宫”;晋悼公葬后,平公即位,三年(公元前555年)“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晋平公八年(公元前550年)“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新田)”;晋幽公时期(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16年)“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新田)、曲沃,余皆

入三晋”。

参考文献

- [1]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J].“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1984年)第一部分:51-71.
- [2]潘明娟,吴宏岐.秦的圣都制度和都城体系[J].考古与文物,2008(1):62-69.
- [3]潘明娟.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85-90.
- [4]田亚岐.雍城:东周秦都与秦汉圣城布局沿革之考古材料新解读[M].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编.新果集(二):庆祝林沅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 [8]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9]马保春.晋汾隰考:兼说晋都新田之名义[J].考古与文物,2006(3):60-66.
- [10]李永敏.晋都新田的祭祀遗址[J].文物世界,2000(5):6-8.

The Holy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the System of Capital of Jin in Pre-Qin

Pan Mingjuan

Abstract: To study on the capital system of J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ly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three capital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city of Jin. Qu-wo (曲沃)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Jin-wugong rose to power and the principal center of sacrifice, so it was the holy capital of Jin, but its religious ritual function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Jiang was the main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of Jin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city of Jin. Xin-tian (新田) was the main capital while Jiang was abandoned in the third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city of Jin. The holy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capital systems of the Xi-zhou, Jin and Qin were all composed of the Holy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capital in Jin of Pre-Qin; the holy capital and the folk capital; Qu-wo (曲沃); Jiang (绛); Xin-tian (新田)

[责任编辑/周 舟]